

服务经济博士论丛·第3辑

Doctoral Research Series on Service Economy · Series 3



Research on Import of Service Trade and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进口服务贸易与我国制造业 的创新驱动发展研究

陈启斐 著

服务经济博士论丛·第3辑

Doctoral Research Series on Service Economy · Series 3



进口服务贸易与我国制造业 的创新驱动发展研究

陈启斐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进口服务贸易与我国制造业的创新驱动发展研究 /

陈启斐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9

(服务经济博士论丛. 第3辑)

ISBN 978 - 7 - 5141 - 7282 - 9

I. ①进… II. ①陈… III. ①服务贸易 - 进口贸易 -
影响 - 制造业 - 研究 - 中国 IV. ①F752.68②F4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0907 号

责任编辑: 齐伟娜 刘懿信

责任校对: 靳玉环

责任印制: 李 鹏

进口服务贸易与我国制造业的创新驱动发展研究

陈启斐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2.75 印张 240000 字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7282 - 9 定价: 3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经济服务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后在产业结构上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来源。Fuchs 在其开创性研究著作《服务经济》（*The Service Economy*）中如此预言：“起源于英国，随后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发生的就业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现象是一次革命；同样，起源于美国，就业从工业悄然向服务业转移的现象，也将是革命性的。”如其所料，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已成为服务型经济国家。如今，发达国家 GDP 增加值和就业的 70% 已经由服务业创造，经济社会运行的关键特征也越来越表现为知识化、信息化和无形化。

对于正在全面走向基本小康社会和力争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来说，大力发展服务经济的重大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制度创新的主要载体。无论是现代企业的产权体系和治理结构，还是现代市场体系的秩序和运作规则，或者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法制化和现代化，其实都是一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如创新赖以有效运作的知识产权制度，各类人才、技术、知识和产权等中介市场，财富驱动创新的金融制度安排，等等，无一不是属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本内容。

第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服务业相对于非服务业尤其是制造业，是一种可贸易程度差、内需性强的产业，因此发展服务业事实上就意味着主要应开拓国内市场，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而不是主要靠外需。中国经济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对应着国内巨大的、过剩的制成品生产能力。这些供给过度的制成品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由于可贸易的程度较高，都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消化到了别国的市场。发展服务经济，不仅有利于缓解第二产业的竞争压力，减少资源、能源和环境的消耗，而且还可以利用其本地化、可贸易性差的特点，就地消化在本国市场，从而实现扩大内需、

降低国际贸易摩擦和转换发展方式。

第三，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关键要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发达国家掌控着非实体的服务经济环节，如研发、设计、物流、网络、营销和金融等，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的低端为其进行国际代工。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升级努力往往被发达国家的大买家压制或者“被俘获”，很难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可以利用其强大的支撑功能成为制造业增长的牵引力和推动力，为制造业的起飞提供“翅膀”和“聪明的脑袋”，从而突破发达国家对于价值链高端的封锁。

第四，居民幸福感提升的重要抓手。现今我国产业结构的重要特点是：与制造业供给严重过剩相对比，服务业许多行业的投资严重不足，产出尤其是高质量的产出处于严重的供给瓶颈，这就是所谓的“总需求向服务业集中而总供给向制造业倾斜”的结构性矛盾。制造业供给严重过剩要求我们在内需不足的前提下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而服务业投资严重不足则是使人民生活在经济高速增长态势下感到不幸福、不和谐的主因。例如，绝大多数中国人始终生活在一种“求人”的状态，子女上学求人，看病求人，办事求人……这一切，其实反映的是“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服务业，如住宅、教育、医疗、养老等不够发达”的现实，反映的是人民生活质量与经济增长严重不匹配。

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态势和趋势，决定了还有太多的理论问题需要研究，还有太多的现实问题和政策需要评估和推敲。实践中，实现服务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机制、路径、手段及政策工具尚不清晰，需要学者们投入热忱，潜心研究。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科和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我国服务经济问题的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先后出版或发表过一系列有关服务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的著作或论文。为了不断地培育我国服务经济学研究的后续新人，在上述两个机构的联合资助下，我们在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帮助下出版了这套以服务经济研究为主题的丛书。我们期待着国内外同行和各界人士携手共同对此开展更加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也欢迎广大朋友对丛书提出建议和批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切入全球制造网络，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全球经济一体化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长达 30 年的高速增长时期，我国的出口贸易取得了巨大的成绩。2009 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发达国家为了解决产业空心化问题，纷纷提出了重振制造业的计划。近年来跨国公司纷纷回迁本土，英国退出欧盟更是加剧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的趋势。经济危机中低迷的外需进一步萎缩，使得我国货物贸易持续下滑。同时因为国内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经济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面临严峻的衰退。事实说明，中国以低端制造业参与第一波全球化的红利已经透支，单纯依靠货物贸易驱动经济增长的战略难以为继，必须寻找新动能和新的贸易增长点。

我认为，我国参与的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一个重要内涵是要在过去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上，主要依托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加速推进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全球化发展。这一内生性增长模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主线。

从实践上看，目前我国已进入现代服务业高速发展的轨道。这为我们做出上述战略性判断提供了充分的事实依据。近 10 多年来，我国服务业增速与制造业增速的差距，虽然鲜有前者超过后者的情况出现，但是两者间的增速之差在逐渐收敛。2012 年第二产业在 GDP 中的占比 45.3%，第三产业占 44.6%，历史上首次使差距缩小在 1 个百分点之内。2013 年 GDP 为 56.88 万亿，同比增长 7.07%，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比为 43.9% 和 46.1%，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越第二产业。2014 年上半年，第三产业的增速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 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服务业占据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达到 50.5%，远超制造业的比重。

我国服务业发展跑出了加速度，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具体的因素在起作用：

其一，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性服务业显示出了具有强大的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影响比较大的是全球制造业需求，因为制造业产业关联度高，需求价格弹性相对大，因此经济危机会深刻地、大幅度地影响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的中国经济。相反，服务业尤其是消费者服务业的需求价格弹性小，市场需求相对稳定，一般不受经济波动的巨大影响。即当服务业占据经济总量的份额不断上升时，在经济发生波动时，因为服务业就业容量大且具有稳定经济的功能，因此可以吸收从其他部门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从而缓解经济增速下降的负面冲击，自然而然地成为反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力量。

其二，现阶段我国的有效内需主要由服务业构成，一般制造业产品都处于严重的产能过剩状态，“去库存”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现在产能不足的部门，几乎都是服务部门，如优质的医疗、教育、养老、住宅等服务，尤其缺乏产业升级所迫切需要的高级知识技能密集型服务，即所谓的高级生产者服务。因种种原因，中国制造业对高级生产者服务投入的不足，是导致中国产业升级进程缓慢的主要的决定性变量。中国扩大内需政策的发力，主要是扩大了市场主体对服务业尤其是传统服务业的需求。未来随着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有效实施，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高级生产者服务的需求会剧增，其增长空间要比传统制造业大得多。

其三，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条件下，一方面某些天然具有本地化需求属性的服务业部门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同时由于服务业跨国转移和贸易也是当前经济全球化新的显著特征，服务业的全球化发展有效地推动了服务业的比重上升。表现为：一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活动，需要获得全球化的贸易、金融、通讯、物流、运输等服务，这些服务业也出现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浪潮；二是信息技术在世界服务业中的应用，使服务业摆脱了“本地化”需求特征，其“可贸易性”越来越强，从而为服务贸易、服务外包等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尤其是国家这些年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支持各种面向全球市场的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外包，使这一新兴的“绿色产业”逐步成为我国产业升级的新支撑、外贸增长的新亮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引擎和扩大就业的新渠道。

服务业内生性增长以及全球化发展趋势，不仅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是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矫正经济失衡的主要政策抓手，而且可以为世界提供发展机会，为别的国家创造就业岗位。就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来说：

第一，可以极大地缓解国内经济失衡。体现在：一是服务业比重高，一般就能相对地缓解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失衡状况。因为，服务业中无论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还是技术知识密集的现代服务业，在收入分配上都天然地偏向于劳动者。这与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有很大的不同。我国在制造业快速发展且占比具有绝对优势的时期，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一个显著后果，是居民部门的收入增速持续地低于GDP的增速。二是能充分发挥服务业的就业蓄水池功能，同时发挥制造业的提升生产率、创造国民经济效益的功能。从农业、制造业的结构调整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都会自然地进入服务业。过去我们把工业当作就业蓄水池的政策是有误的，工业其实是创造国民经济效益的部门。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上升，会不断地把排斥出来的劳动力推送到服务部门。三是把资源重点投向服务业，有助于结构调整和提高投资效率。目前中国短缺的产业不是一般制造业，也不是“铁公基”等基础设施，而是与民生幸福有关的优质教育、基本住宅、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放松政府对服务业的不必要的行政管制，将产生巨大的扩张内需的投资机会，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投资回报率。四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有助于扩大消费。对制造品的消费比较充分而对优质服务品的消费不足，是目前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大力发展服务业有助于解决优质服务品的供求矛盾，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升级。

第二，可以极大地缓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目前解决此失衡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思路，它们与是大力发展还是坚决抑制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一是通过对金融活动的严厉管制，以及抑制市场主体的金融活动来适应实体经济的要求，如对利率进行严厉管制来应对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上升势头，严格禁止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创新行为以防止风险，等等。这其实是“削足适履”。二是通过创新增加高质量的金融资产供给，平抑因金融资产的长期短缺而导致的虚拟经济过火的势头。这是可行的“阴阳平衡”战略。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产业转型，并不是说我们只要发展服务业，而不要发展制造业了。制造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离开了制造业的发展，只会造成服务产出的产能过剩，并形成新的经济泡沫和

导致经济危机。以制造业为基础发展现代服务业，服务业才能具有扎实的市场需求基础，才能利用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制造业。

同时必须强调，制造业发展不能仅仅是规模的扩张，也不能只强调高端化的客户升级。仅强调规模扩张会造成进一步的严重产能过剩；仅强调高端化升级是把产业升级引入不归的歧途。因为，如果制造业升级不是瞄准全球 40 亿人口的中低收入者的大众市场，而是去做 1 亿高收入人口的小众市场，一方面我们将过早地与发达国家进行正面的较量和竞争，凭中国企业现有的技术实力、管理实力、资本实力等，我们不一定有胜算的把握；另一方面，丢掉我们的市场竞争优势，去做我们没有比较优势的事情，也不符合经济学理性。因此转向新的经济全球化，一是制造业升级要更多地体现为生产率的提升，根本目标是通过生产率上升抵消综合成本上升趋势，与竞争对手比试低成本效率；二是在生产率上升的基础上，以性价比优势占据世界中低端收入者市场，并以此为主要的产业升级目标；三是要把一部分由于生产率提升而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经过国家引导的职业培训后进入各类服务业，利用成本优势发展质优价廉的服务业，同时与发达国家企业竞争，发展服务贸易，承接服务外包业务，抢占世界服务市场的制高点。

从理论上讲，以制造业生产率提高为目标进行产业升级，会对服务业占比产生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它会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从而对服务需求提高产生积极的正向作用，即通过收入效应提升服务业的比重；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率高的制造业出口比例高，因此又会通过制造品的出口效应，增加制造品的出口比重，同时抑制服务业占比的提升。因此，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对服务业占比提升的综合效应，我们并不能事先给予确定，而要看这两个效应在一定时期内的孰强孰弱。在目前中国现实的经济运行中，问题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生产率的上升幅度不能抵消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势头。这一趋势抑制制造品的出口效应，同时收入的超前化增长使本地化的服务业消费和内需得以扩大，反而使服务业占比得到了迅速的上升。但是这一趋势对中国服务业进入全球的竞争力有负面的影响。因此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提升产业生产率。

针对我国已经进入现代服务业高速发展期的趋势，目前一些理论和政策对此存在误判。如某些理论将服务业高速发展与金融危机内在地联系起来，认为金融危机是由于本国“去工业化”后服务业的高度繁荣所引起的。此观点对面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任务的中国危害甚大。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一是与搞制造业还是搞服务业没有任何关系，制造业的严重产

能过剩也会发生金融危机；二是与金融资本的趋利本性无关，只要是资本，一定是趋利的，不趋利就变成了慈善事业。总的来说，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主要与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机制的不良设计和失控的运行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那种把实体经济等同于制造业、把服务业等同于虚拟经济的政策取向和做法，就是上述认识的具体体现。在现阶段，把制造业界定为实体经济，认为反危机政策就是要全力发展制造业，同时认为服务业是虚拟经济必须抑制的观点，是十分有害的。制造产品和服务产出都能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它们之间的区分只是有形与无形，而非实体与虚拟。实体经济与泡沫经济的区分，要看这个部门的“杠杆率”运用水平，经验证明，杠杆率大于20倍，一般就是泡沫经济，即使是生姜、大蒜等产品，也会变成泡沫经济。因此服务业不一定就是虚拟经济，同样，制造业利用的“杠杆率”过高，产能发展过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这种观点把资源错误地引导到已经严重过剩的制造业，将会导致下一轮严重的经济风险。因此我们不要因为强调制造业重要，就走向轻薄服务业。我们应该反对的是服务业过度金融化。我国新一轮的稳增长政策如果把资源重新砸向产能过剩的制造行业，会引发巨大的经济风险。其实如果把资源投向同样具有实体经济性质的现代服务业，更能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与促民生相结合。

服务业发展也要开放化，也要像制造业一样利用全球分工。当今世界服务贸易的迅猛发展，显示出服务业不仅具有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强烈的全球化倾向，也显示出开放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可能性。自2000年以来，全球服务贸易飞速发展。2013年，全球服务贸易额已经占据全球贸易总额的1/4。尤其是金融危机期间，全球货物贸易急剧萎缩，但是服务贸易额却逆势上涨，表现十分亮眼，引起了政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我国的货物贸易几近饱和，但服务贸易却呈现出飞速发展的态势。在“十二五”期间，服务贸易年均增长超过13.6%，位居世界第二。其中，中国的服务进口贸易额从1982年的20.24亿美元飙升至2375.76亿美元，足足增长了117.38倍，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背景下，服务贸易的变化作为世界经济景气状况和服务业发展的“风向标”，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人们现在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各国对商品的购买力降低，全球服务贸易还会不会成为接替商品贸易成为新的贸易增长

的动力机制？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忽视服务贸易在全球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是不可容忍的。关注服务贸易的溢出效应，不仅可以丰富服务贸易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贸易理论；同时还能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方向以及未来服务业开放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导，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服务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属于全球经济最新的研究课题，在学界尚没有一个标准的分析框架和统一结论。主要的研究团队集中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服务贸易与就业上。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研究相对不足，本书弥补了相关领域不足。由于我国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对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支撑作用有限，因此对于外部的服务要素尤其是生产性服务要素的需求极为旺盛。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服务贸易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服务贸易可以引进技术和知识含量更高的高端服务品，弥补我国产业结构扭曲诱发的服务业“成本病”问题，为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提供新的路径选择。

陈启斐博士的这本著作，是在他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不断修改和完善而出版的。在研究中，我鼓励他在开放经济中，研究服务贸易、产业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他据此分析的服务外包、技术溢出和创新等方面问题，体现了较深厚的学术功力，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该书的主要特色有：

第一，从视角上，将全球技术扩散从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指出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是全球技术进步新的途径之一，从而将基于货物贸易的理论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

第二，从理论上，将发展中国家在创新领域的问题，转化为通过发展服务外包进行再创新的命题，进而提出了我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新的路径和战略选择，突破了主流经济学关于产业升级途径的论述。

第三，从方法上说，本书基于投入产出表和全球服务贸易数据推导出服务外包新的测度方法，为定量分析服务贸易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方法。

近二十年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通过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逐步扩展到国际贸易学、宏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学科，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更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新秀。尤其是，今年成立的智库性质的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更是致力于将理论成果应用于解决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初步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社会反响。陈启斐博

士的新作，正是将产业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相结合，基于“全球化、融合化和本地化”的研究范式，将产业创新问题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在该书出版之际，我向大家推荐这本新作，希望该书能够对读者有所启发，对产业经济学学科创新有些边际贡献，对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政策有所启迪，对他的成长有所激励。

刘志彪

2016年9月19日

于南京大学安中楼

目 录

Contents

第1章 导论	1
1.1 问题的提出 /	1
1.2 研究意义 /	2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4
1.4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13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7
第2章 进口服务贸易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19
2.1 全球进口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	19
2.2 中国进口服务贸易的主要特点 /	24
2.3 进口服务贸易动因分析 /	26
2.4 本章小结 /	42
第3章 进口服务贸易、R&D 溢出与技术进步：基于47个国家的 双边服务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	44
3.1 问题的提出 /	44
3.2 理论模型 /	46
3.3 计量模型、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 /	53
3.4 进口服务贸易 R&D 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61
3.5 拓展研究：进口服务贸易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69
3.6 本章小结 /	73
第4章 进口服务贸易与后发国家技术追赶：基于中国和印度的 比较分析	75
4.1 问题的提出 /	75

4.2	计量模型、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	/ 77
4.3	进口服务贸易对中国与印度技术追赶的实证分析	/ 79
4.4	进口服务贸易与中国技术追赶的门槛特征分析	/ 84
4.5	本章小结	/ 90
第5章	进口服务贸易对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	92
5.1	问题的提出	/ 92
5.2	我国制造业服务外包的测算	/ 93
5.3	理论模型	/ 100
5.4	计量方程设定和数据来源说明	/ 103
5.5	进口服务贸易对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	/ 105
5.6	本章小结	/ 110
第6章	进口服务贸易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实证分析	111
6.1	问题的提出	/ 111
6.2	进口服务贸易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理论分析	/ 112
6.3	计量方程设定和数据来源说明	/ 114
6.4	进口服务贸易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实证分析	/ 115
6.5	本章小结	/ 120
第7章	进口服务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创新要素积累的实证分析：基于人力资本视角	122
7.1	问题的提出	/ 122
7.2	理论模型	/ 125
7.3	计量模型、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	/ 133
7.4	进口服务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就业市场的双重偏向效应实证分析	/ 135
7.5	进口服务贸易对制造业就业市场双重偏向的门槛特征分析	/ 139
7.6	本章小结	/ 144
第8章	研发外包是否会抑制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基于中国制造业双重创新维度的门槛效应分析	145
8.1	问题的提出	/ 145

8.2	理论模型 /	146
8.3	计量模型、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 /	151
8.4	实证分析 /	155
8.5	研发外包对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门槛特征分析 /	162
8.6	本章小结 /	166
第9章 总结和展望		168
9.1	研究结论 /	168
9.2	政策建议 /	170
参考文献.....		172
后 记.....		184

1.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出现了一系列让人担忧的现象。艾密特和弗罗因德(Amiti and Freund, 2010)研究发现,1997~2005年间,我国出口产品种类没有增加。这意味着,我国的出口总量虽然不断增加,但是依旧以低附加值的初级品为主。马诺瓦和张(Manova and Zhang, 2009)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发现,一小部分大型外资企业主导了我国的出口贸易。张少军(2013)发现,加入全球生产网络容易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冲击,加剧经济波动。发达国家利用外包将国内的经济波动传导给接包国,造成发展中国家过度繁荣或者过度萧条。这种冲击同时伴随出口和进口两个渠道发生。牛卫平(2012)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仅仅依靠低成本优势承接国际外包,容易造成承包模式的固化,进而被发达国家“俘获”。张杰等(2013)研究发现,出口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增加值率造成了抑制效应。笔者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在现有的全球价值链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是体系的掌控者(链主),利用其“先发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低端锁定”或者是“纵向压榨”(Humphrey and Schmitz, 2004)。“两头在外”的外向化发展模式抑制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刘志彪、张杰, 2009),服务业发展滞后又进一步压缩了我国制造业的升级空间。链主可以提高“技术壁垒”或者“行业标准”来封锁我国产业升级路径,对国家的R&D补贴或者企业研发收益进行稀释。在倡导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大背景下,外部需求持续萎缩以及“技术壁垒”不断提高,进一步加大了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两端攀升的难度。如何

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升级路径，顺利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球服务贸易量从 1980 年的 8 434.31 亿美元迅速飙升至 2011 年的 83 251.59 亿美元^①，增长了 9.98 倍。以服务贸易为代表的中间品贸易份额已经占据了全球贸易总量的一半以上的份额，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弗朗索瓦和赖纳特（Francois and Reinert，1996）的跨国研究表明：当一国迈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服务贸易将逐步取代货物贸易，成为一国新的增长点。服务贸易出口可以维持经济增长，而进口服务贸易能够扩大工业部门中间品的种类、提高质量，强化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背景下，服务贸易的变化作为世界经济景气状况和服务业发展的“风向标”，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各国对商品的购买力降低，全球服务贸易还会不会接替商品贸易成为新的贸易增长的动力机制？众所周知，服务贸易是由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双重驱动的，服务贸易中 73% 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流入生产环节（Miroudot，2009），这意味着服务贸易与生产环节高度契合。通过对生产环节的刺激作用，进口服务贸易将推动经济增长。在这样的模式下，服务贸易的扩张究竟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又是通过哪些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的？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和发展服务贸易占据主导态势下的国际贸易理论，还能据此调整国家贸易政策和制定新的服务业发展战略，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研究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是经济学界最为古老、也是最为悠久的课题。自从英国经济学家 D. H. 罗伯逊（1937）提出了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命题后，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研究二者的关系，相关的文献也十分丰富，而且在不同时期研究的核心问题不尽相同。但是在早期，由于技术的限制

^① 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UNCTAD，2012）。